

書 評

鄭 維 中*

Ma Guang 馬光

Rupture, Evolution, and Continuity: The Shandong Peninsula in East Asian Maritime History During the Yuan-Ming Transition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21, 230 pages. ISBN 9783447117005

海洋史學者魏思韓 (John E. Wills, Jr., 1936-2017) 過世之前，曾經以一篇專文探討亞洲海洋近世在蒸汽船時代來臨前經歷的演變階段。亦即，以風帆時代的技術能力作為表徵的話，直到十九世紀蒸汽船運實用化後，才能說因為人類技術能力的提升而引動一連串的時代改變，使得亞洲逐漸由「近代早期」(early modern) 進入「近代」(modern)。¹然而在全球人類踏上「近代」的共同道路之前，近代的準備階段：「近代早期」始於何時，學者間則莫衷一是。魏思韓此文認為，從海洋交流的角度來看，宋代泉州已是連結歐亞世界的大港，而海上的通路也可一路由中國經東南亞延展至印度洋。從中國對周邊海洋的關係來看，宋、元、明、清五百

2022 年 9 月 5 日收稿，2022 年 11 月 6 日修訂完成，2023 年 4 月 28 日通過刊登。

* 作者係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Weichung Cheng,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 1 John E. Wills, Jr., "A Very Long Early Modern? Asia and Its Oceans, 1000-1850," in "Conversations on Transpacific History," special issu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83, no. 2 (May 2014): 189-203.

年的發展，似可考慮為一個連續的「近代早期」歷程。² 相對於由十五世紀以來美洲銀礦發現後形成世界白銀流通網這種「早期全球化」現象，中國人的海外活動，可說是順應了世界的發展，並且利用這樣的全球網絡獲利。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宋代以來的海外發展，就能看做是中國走入現代的「一個非常長（近代早期）」的準備。魏思韓之所以特別關注中國走入近現代的課題，主要與其師承費正清（John K. Fairbank, 1907-1991）一派的觀點，著重觀察中國傳統社會如何在與西方交往中逐步踏入現代社會有關。³ 此種中國海洋史書寫脈絡的出發點，與本書馬光專注於元明之間的歷史演變，稍有不同。馬光所未曾言明之處，亦在於其師承蕭婷（Angela Schottenhammer）教授，大體上採取法國年鑑學派布勞岱（Fernand Braudel, 1902-1985）所提出來的「地中海史」的模式，意欲以長時段（long durée）的環境與社會經濟因素，來觀察亞洲各個海域周邊人群歷史的發展。⁴ 此一想法本著德國漢學家普塔克（Roderich Ptak）多年來提倡「亞洲地中海」（Asian Mediterranean）的思路。⁵ 與魏思韓的理論立場相比，「亞洲地中海」的概念並不拘泥於回答「亞洲近代的樣貌何以如此？」而是更希望能從亞洲本身論亞洲，去尋找屬於亞洲本身的歷史發展動力與結構。就此而言，普塔克已經指出過，對於東亞海域的地理環境與海洋發展來說，大陸沿岸突出的半島與海峽，往往扮演著舉足輕重的地

2 Wills, "A Very Long Early Modern?" 191-5.

3 John K. Fairbank, "Introduction: Maritime and Continental in China's History," in *Republican China, 1912-1949*, part 1, ed. John K. Fairbank, vol. 12,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1-27. 文中引用了魏思韓的定義，將「海洋中國」的「主要範圍」限於長江三角洲至海南島的沿岸地區、澎湖與臺灣，其外圍則是九州、沖繩與呂宋島。

4 Angela Schottenhammer, preface to *The East Asian >Mediterranean<: Maritime Crossroads of Culture, Commerce and Human Migration*, ed. Angela Schottenhammer.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8), 1-3.

5 Roderich Ptak, "Quanzhou: At the Northern Edge of a Southeast Asian Mediterranean," in *The Emporium of the World: Maritime Quanzhou, 1000-1400*, ed. Angela Schottenhammer (Leiden: Brill, 2001), 395-427. 當中指出 Denys Lombard (1938-1998) 如何將布羅岱式的「總體歷史」概念用於東南亞，並延伸到南中國海。

位。⁶馬光本書《斷裂、演進與延續：東亞海域歷史中元明轉折期的山東半島》即延續著這樣的思路，而嘗試探討山東半島、渤海海峽、遼東半島三者的自然環境與其在長期區域交流中扮演的角色，藉此重構過去官方歷史書寫中，受到行政區域割裂侷限的東北亞海域周邊濱海人群歷史。兩種典範相比之下，亦能看出本書意圖挑戰過去中國海洋史研究偏重明清以降東南沿海發展（p. 162），而輕忽宋元以來北方沿海歷史走向的學術背景。本書對於元明之際山東半島的研究，正好是應用「亞洲地中海」典範可能發揮較多長處的領域。

本書在導論之外，共分六章。全書敘述元帝國出征日本前後，東北亞中、日、韓間，曾有繁盛的貿易景象如何由絢爛轉入平淡。書中指出元末大亂，倭寇肆虐後，因明帝國海防體系逐漸建置，先是短暫由官方疏運取代先前的私人海運貿易，然後終於在明帝國實施海禁與東亞朝貢秩序確立後，終止了海上貿易活動。本書頭兩章即說明明初海禁政策施行後，山東私人海上貿易逐漸衰落，而官方貿易逐漸整編至朝貢制度的體系內這樣的變化。藉此，馬光論述了元明兩朝在海上貿易制度上的轉折，如何框架了山東海上貿易活動的發展。馬光從鼓勵貿易到施行海禁這樣的「斷裂」（*rupture*）過程，來看待對應這樣過程中，高麗、遼東、山東各處人們的海上活動，以及他們曾經如何因應局面變化做出調適。在確立了明帝國海禁政策在歷史上的重大意義後，後續三章，馬光則深入探討從明太祖開國前到明成祖繼位後，整個明帝國如何在中、日、韓三國的交涉中，逐漸演化出海禁與朝貢相互配套的體系。馬光認為，元末大亂與倭寇入侵中韓，都與環境史上所謂「中世紀溫暖期」的結束相關。明太祖在與北元勢力交戰時，因與張士誠、方國珍勢力相掙，未能掌握強大水軍，先天上難以防衛山東半島等處。太祖開國後，數度遣使至日本，要求日本當局壓制倭寇。此一外交手段，卻因為日本內部有天皇與幕府分立的情況，難以獲得成效。最終太祖只得逐步增強中國沿海海防衛所，並確立海禁。在這樣環環相扣

6 Roderich Ptak, "Some Glosses on the Sea Straits of Asia: Geography, Functions, Typology," *Crossroads: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Exchange Relations in the East Asian World* 1 (2011): 78-98.

的探討中，馬光展示了山東海上活動內在「演化」(evolution)的動力。最後一章馬光則特別探討明代開國初年，經由山東大規模海運軍用物資，跨越渤海海峽，支援遼東的事例。既然元代晚期由江南疏運穀物至大都的需求，年年增加，而派用海運，亦歷有年所，那麼明代初期由山東經渤海海峽疏運糧草到遼東，應可認同為元代私人海運的延續(continuity)。不只如此，馬光還發現，在遼東達成糧食自給，海禁完全施行後，從事渤海海運的相關人員，亦將其技術能力延伸到鄭和下西洋的艦隊當中發揮。此章因此說明了明帝國海上事業，在人員與技術上的「延續」。結論重新描述本書在學術上所做出的新貢獻，與過往研究重心差異之處等等。在結論之外，並附有高達 8 篇附錄，將極其繁瑣的考校論證與清楚的事實序列、地方衛所歷任官員等，清楚表列出來，俾使讀者往復對照之用。

總結來說，就「長時段」的觀察而言，針對山東半島、遼東半島、渤海海峽三者作出研究幾乎是必然要面對的課題。因為不管是從十九世紀以來中國沿海的貿易航路，還是二十世紀後中日韓煤鐵交換的海運動脈來說，此一區域都曾占有重要地位。只是若將焦點置於明清中國與西歐各國的早期海上交流，則此一區域發展的關聯性就不那麼明顯。同樣，若聚焦於宋元中國與印度洋的強烈聯繫，此一區域的海上活動發展，亦難以認定扮演重要角色。而中日韓三地人民間在歷史上的互動，雖然頻繁，在元明時代卻也很少能找到清晰的官方文字紀錄。再加上，元代此海域一度充斥海運活躍的盛況，在明帝國施行海禁後嘎然終止，此一劇烈的歷史轉折必定需要一個解釋。馬光此書可說是為「長時段」亞洲海洋史的歷史研究添上了一塊堅實的礎石。

在學術上頗具價值者，當然是馬光在正文以及附錄當中所完成的種種繁瑣考證。在此限於篇幅與評者能力，僅舉例數項值得重視的貢獻。

如同前述，本書在〈導論〉中「方法論」一節，特別探討了布羅岱的「地中海」研究模式是否適用於亞洲海域的問題，馬光援引了王賡武對於「地中海」模式應用於亞洲時，不得不面對中國在區域中的文化與物質影響力獨大的狀況這個看法，因此決定不能放棄由朝貢體系來探討中日韓三國外交互動的觀點。不僅如此，元末明初的狀況，與學者們過去專注討論的晚明至清朝時期不同。當時朝貢體系尚在形成之中，明太祖對於經貿與儀式

上的重視並不如他對外交上實效的關心 (pp. 10-11)。明太祖積極與日本交流的外交姿態與外交手段失利後採取海禁政策恰成對比，馬光此書因此由這個特殊的地緣政治轉折，來重探所謂的「元明轉折」問題 (pp. 165-6)。

所謂明太祖對日的積極姿態，表現其數度遣使日本，並要求日本當局控管倭寇的行為上。過去日本中世史學者如村井章介，多少都曾經注意到明太祖對日遣使所發出的國書中，數度直接指涉倭寇問題此事。⁷ 馬光認同這樣的論斷，並且認為明太祖對於壓制倭寇這個實用目的的關心，高於取得日本入貢帶來的正當性 (p. 83)。為了更細緻的確立此一論斷，馬光詳細考證了 1370 年太祖派遣趙秩出使日本的始末。並且認為當時日本南朝懷良親王改變對抗明朝態度的原因，除了趙秩出使外，還包括了二度出使日本的楊載，同時護送 15 名倭寇歸還，也與懷良親王會面 (p. 90)。馬光因此詳細論證了日明初期外交與交涉倭寇問題乃是一體兩面。

確立了倭寇問題與明初種種國家政策有關此一事實後，元末明初的倭寇侵擾程度、範圍甚至成因，便成為同樣需要澄清的問題。馬光指出四庫叢書中收錄，程端禮《畏齋集》的謬勒哲圖 (Öljeitü, 1299-1344) 行狀中，關於倭寇於 1320 年代侵擾浙江鄞縣的記載，應為一個標誌性的事件。馬光考證了謬勒哲圖在不同文獻中 (謬勒哲都、懷完者禿……) 散記約 16 種寫法 (pp. 56-61)，確立了元末倭寇出現的時段。馬光又利用揭泐墓碑碑記的記載，確立了倭寇在 1362 至 1368 之間，已出現於渤海灣沿岸 (pp. 63-64)。這些都是非常細密扎實的考證。

在倭寇成因方面，馬光將「中世紀溫暖期」的結束，當成倭寇侵擾中韓濱海地區的一個重要背景。馬光援引了西方、中國、日本三地 1980 年代以來對於「中世紀溫暖期」結束、「小冰期」開始的研究成果，綜合得出結論，約當 1220 年代起，東北亞平均氣溫開始下降，而在 1350 年代至 1380 年代，平均氣溫發生劇降。此氣候惡化造成的種種天災地變，與倭寇襲擊韓國與中國之記載，具密切相關性 (pp. 73-74)。在目前探討倭寇史的研究中，尚且少有人注意到整體的環境變遷並將中日韓同時納入討論者。馬光的論點相當有意義。

7 (日) 村井章介，《アジアのなかの中世日本》，(東京：校倉書房，1997)，頁 237。

儘管此書在理論關懷、事件考證、脈絡詮釋上多有值得注意的貢獻，本書仍有某些說服力較為薄弱、需要更多證據補強的部分。例如全書中探討元末明初海上貿易的連續性時，首先需說明元末山東半島私人海上貿易的興盛情況。馬光引用了朱晞顏於 1291 年經海路前往朝鮮半島的一連串詩作、還有 1984-2005 年間，考古學者於蓬萊所挖掘出瓷器的研究報告。馬光論斷，由於在山東半島的蓬萊與遼東半島的錦州所掘出的青白瓷，已經為考古學者證實為相同的產品，藉此能證明元末應有大量商品透過海運，穿越渤海海峽由山東半島進入遼東半島（pp. 20, 37-40）。此一論證固然有科學性的基礎，卻仍然很難據此評估當時通過渤海海峽的私人貿易規模。此一論證相較於全書鋪陳歷史的連續性的宣稱來說，力道稍嫌不足。其他較小的缺陷，尚有如地圖 2（map 2）將遼東（Liaodong）誤標為（Shandong）。這樣的錯誤雖然對於專家讀者來說可以忽視，但卻可能影響對此領域不熟悉的讀者，應早日修改。以上這些瑕疵都不影響評者認為本書成為中國、東亞海洋史領域中一本廣受認可著作的評價。最後，本書因涵蓋中日韓三地互動之歷史，似應嘗試與美國學界現有之研究成果對話。例如 Peter D. Shapinsky 所著 *Lords of the Sea* 一書中曾探討明代早期中韓對於「倭寇」的看法，值得參考。⁸ 讀者應注意本書在此一方面仍不完善。

8 Peter D. Shapinsky, *Lords of the Sea: Pirates, Violence, and Commerce in Late Medieval Japan* (Ann Arbor: Center for Japa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14).